

吳敬恆砥柱中流

章君毅

不考八股不纏小脚

吳敬恆（稚暉）先生以一位「懵然不知革命爲何物，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」，曾經自許其「頂戴放洋、水中殉義」洵屬難能可貴的「八股先生」，太平天國洪楊戰役時期的大清子民，居然成爲國民革命的先覺，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特別推重的革命聖人。不但國父對他總是肅然起敬，尊之爲師。總統蔣公尤曾說過：「吾黨同志對先生莫不以師禮事之，尤其是我，平生承教請益，感受最深。」吳敬恆先生從遜清舉人到「燃了灰，還是國民黨的黨員」此一人生重要歷程，只要能够抽絲剝繭，詳徵博引，源源本本的照實寫下來，就是富有傳奇意味的吳傳之一章。

所謂的「陋儒」、「八股先生」、「洪楊戰役之人」，都是吳敬恆先生對「過去之我」所作的自況之詞。他七歲啓蒙，十八歲開始教讀，晚間常和同學泡無錫崇安寺春源茶社，暢談八股制藝。二十四五歲的時候，讀到蔡元培先生的三篇「怪八股文」，他還在猜度蔡先生必定是一名「怪誕駢馳之士」。後來有不少應試仕子做做，竟然被清真雅正的八股家，太息以爲文妖。其實呢，蔡元培先生所創始的新八股，也不過多用些周秦諸子的典故，爲讀書人吐一口惡氣，打倒打倒高頭講章而已。因此，往後連吳先生也爲之恍然大悟；那正是早年的新文化運動，——拖上一枚用香烟罐頭草草製造的炸彈。

二十三歲入縣學，兩年後考進江陰南菁書院，二十七歲中舉，翌年晉京赴試，他的座師是李石曾（煜瀛）先生的令尊，時任禮部尚書的李文正公李鴻藻。在這一科中了進士的民國名人有民元浙江都督，交通總長湯壽潛。

潛、教育總長蔡元培、安徽、直隸都督朱家寶。吳敬恆先生的卷子則曾予堂備，而未獲取。三十歲到三十九歲間，他在天津、上海等地教書，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，在天津北洋學堂任教，北洋學堂總辦王苑生是個新派人物，正和夏穗卿、嚴復、孫寶琦等人辦國聞雜誌，國聞日報，譯載天演論，倡導新學。夏穗卿他們不時也請吳稚暉先生爲報紙雜誌寫寫文章，吳先生自以爲他已經「新」得够厲害了。然而，當他班上的學生王建祖、徐田，另一班的王寵惠、薛仙海等，經常大發皇帝是公民奴僕的議論，竟使吳先生聽得很不順耳，他以爲他們是受了康有爲、梁啟超之輩所放的「過激空氣」影響，決心在批改作文的時候，加以矯正。有一次，他特地出了個作文題目：「率土王臣論」，那兒想到，比他思想更新的那些學生，覺得這個题目的本身就過於陳舊，紛紛在文章裏有所非議，把詩經小雅北山篇裏的那句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借題發揮，痛加駁斥。吳敬恆先生本着他的「陋儒忠君」思想，不惜破費功夫，在每一篇作文之後，批上數百乃至一兩千字，告誡他的學生「烈女不事二夫，忠臣不事二主。」

可是，這許多批語給北洋學堂總辦王苑生看到了，却大大的不以爲然。他批上加批，反駁吳敬恆先生的「愚忠論」，有云：

「洵如是也，孔子之周遊，孟子之歷聘，皆爲不規於大道也！」

這真叫做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」。倘若必須「忠臣不事二主」的話，那麼，孔子就該永遠留在魯國，而孟子又何必去歷聘於各國呢？但是吳敬恆先生却憾於總辦和他意見不合，當年六月，便託故辭職，飄然南旋了。由這一則小掌故，也可以令人想像得到，戊戌之前，吳敬恆先生的思想是何等的落伍、頑固。

吳敬恆先生自己記述他思想轉變的過程，他曾經幽默風趣的說過：

「在甲午以前（按指光緒二十年，公元一八九四，中日之戰，日勝而我敗。——筆者謹註），一懵不知革

命爲何物，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。經甲午慘敗，始覺中國不能不學西方工藝。學了西方工藝，才能造大砲機關鎗，抵抗敵人，所謂『興學之不容緩』，乃開始冒充爲新小卒。以後受了許多刺激，才一步步的『浪漫起來』。直到癸卯（光緒二十九年，一九〇三）在上海張園演說，演高興了，才開始說革命。」

實則，甲午一役，不過給了吳敬恆先生一次較爲深鉅的刺激，促使他有所覺醒，對於腐敗的清廷，有了正確的認識，從而想要改革，演至革命。吳敬恆先生的思想，正如 總統蔣公所頌揚他的：「先生的思想是永遠進步的，故其學問亦是不斷革新的。所以他決不以古非今，亦不以今非古，而力求民族文化的發揚光大。他認爲宇宙不斷的生生不已，人類的智慧也進展不已。他所謂這個『不憚煩』的宇宙，不斷創造事業的正是人類『舞台』。『唯其如是，始能引而前行』，『日新又新』。像我們這樣五千年悠久的民族，所以至今仍能卓然自立於世，而不受邪說暴力的腐蝕與摧殘者，其故即在於此。這就是先生『萬物並行而不相害』的進化論！這亦就是他一生活潑潑地天機，生生不息的精神，無往而不樂觀之所自出也。」

我們試從吳敬恆先生少年青年中年時期的許多軼聞軼事來看，就可以獲知他思想永遠進步，學問不斷革新，「活潑潑地天機，生生不息的精神」之所在。吳敬恆先生曾經自承：他從小便有殺韃子的快意觀念，而且，早在甲午中日之戰兩年以前，他赴京應試落第歸來，仍舊回到江陰南菁書院繼續攻讀，有一天，當地的父母官，江陰知縣昂然乘轎經過孔廟，被吳敬恆先生和他的同學鈕惕生、田其田等看到，認爲這位縣太爺非聖無法大不敬，檢起了地上的石塊，照定了縣太爺的官轎便砸。這一砸可把那位縣太爺砸得大光其火，他喝令衙役，將吳敬恆先生扭送知縣衙門，打算從重處分，有以洩憤。眼看着吳敬恆先生就要當堂大喫其虧，幸有同學趕回書院報訊，南菁書院的山長是浙江定海人黃以周，他聞訊後立赴縣衙門辦交涉，江陰縣這才曉得吳敬恆先生是位舉人。舉人本身就具有掌書院的資格，可以和縣太爺平起平座，還不許縣太爺端茶送客，他跟縣太爺信函往來，

日警逮捕吳稚暉先生的前夕，民國元年七月當了北政府教育總長的范源廉，把吳稚暉先生拉到他的東京牛込區寓所，避避風頭。當夜，他告訴吳稚暉先生說：有一位山東鄧姓秀才，正在熱河赤峯據地七百里，糾衆一萬人，獨樹一幟，實行反滿革命，極有希望可成大事，而且已經遣人來日，請梁啓超前往主持。但是梁啓超却表示婉謝，他不想去。范源廉說，如果吳稚暉肯去的話，必定大有可爲。——他實已透露了保皇黨的一大秘密。

吳稚暉先生曉得這話斷乎不假，祇不過，以寥寥七百里，區區萬餘人，又怎知大有成事之望呢？於是范源廉又更進一步的「洩漏機密」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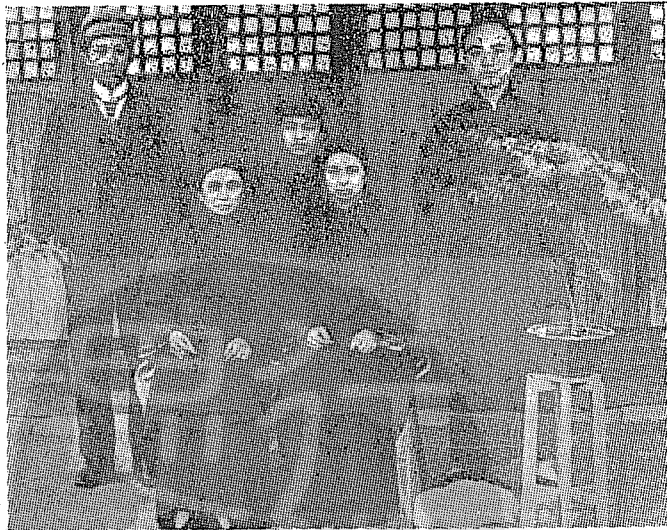
「因爲清廷派往刺捕的一名提督，正是楊哲子的叔叔，哲子已經和他有約。」

哲子，是湖南湘潭人楊度的號。楊度，舉人出身，爲三湘大儒王闈運的高足，這年自費留日，攻讀於東京弘文學院，係湖南留學生中風頭十足的人物。吳稚暉聽范源廉這麼說，當下心中明白，倘有機會，楊度也是會造反的。他正在考慮這一件大事，那一夜，他們談到凌晨四時方始入眠。然而，蔡鈞誣告吳稚暉先生「妨害治安」，前來逮他的日警，早已追蹤到范源廉的寓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方出大門，日警便高聲喊他的名字，吳稚暉先生猝不及防，一回頭，立刻就被日警逮住，押他回小石川住處，然後連同一位宋寒匡（揆均），一併押解出境。

吳稚暉先生乘回寓收拾行李的時候，寫就了如下的一封信絕命書：

「信之以死，明不作賊，民權自由，健邦天則。削髮維新，片言可決，以尸爲諫，懷憂曲突，唏噓悲哉，公使何與？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亡國之慘，將有如是。諸公努力，僕終不死。」

押解途中，他乘日警不備，奮然投水自殺，幸而被日警入水救起，移送長崎，登法國郵船遣返上海。當時



早年時代的吳敬恆（右）偕其夫人（右二）、次公子（中）、岳太夫人「左二」、長公子合影。

吳敬恆砥柱中流

蔡元培先生在當上海南洋公學特班生總教習，正在乘暇赴日遊歷，到了還沒幾天，就聽說吳稚暉先生抗議日警裁判不公，憤而投水事。他唯恐吳稚暉先生情緒激動，再生意外，特意中止行程，自動伴送吳氏回國，這便是吳、蔡二氏正式訂交之始。在此以前，吳稚暉先生僅祇在南洋公學任教時，偶然在馬路上遇見過幾次蔡元培先生，而有人告訴他說：

「這便是蔡元培，字鶴卿，能作怪八股文的那一位名進士。」

由於乏人正式介紹，所以吳、蔡兩氏先前並未結識交談。吳稚暉先生對於蔡氏的第一眼印象，是爲：「弱不勝衣，恂恂然儒者也。」想不到這位文弱書生居然鐵肩担道義，自告奮勇，護送素不相識的吳稚暉先生返國，因此二氏一語便合，建立了生死不渝的摯切友誼。

歸國旅次，法國輪上，吳稚暉猶在興高采烈的和蔡元培先生大談特談赤峯革命的事，蔡元培先生的反應是微微而笑，他說：

「原來梁啟超，也曉得立憲之事不可成呀？」

吳稚暉先生望着他哈哈大笑，從此以後，他棄康梁的維新、立憲主張如敝屣，不再以維新黨員自居，同時，和蔡先生在船上兩日劇談，這兩位好友獲致了一項結論：非革滿清的命不可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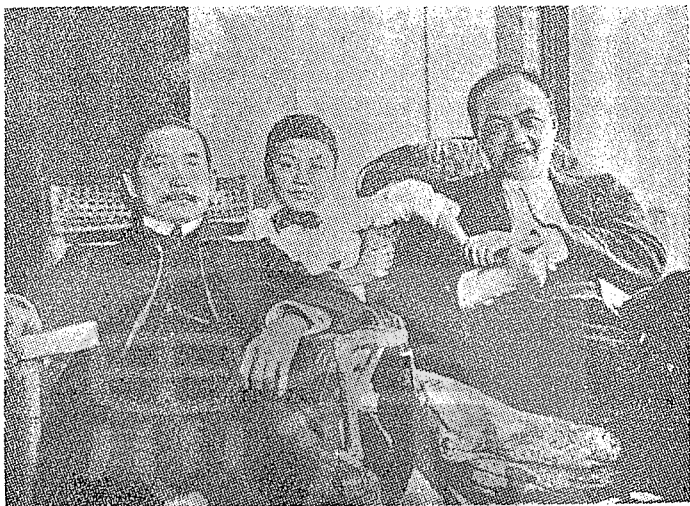
吳稚暉先生怎麼會從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」論者，一變而為維新黨人，再變而為革命巨子，民國元勳？甲午戰敗，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是雙重刺激，康梁的早期鼓吹，也有推波助瀾的助力，國內的朝政失修，清廷昏庸，將自喪權失地，導致亡國滅種尤為莫大警惕，但是，吳稚暉先生兩度和滿清官吏交往，親眼目擊那種臭而不可聞也的官場現形記，更是更大的因素之一。吳稚暉先生在天津北洋、上海南洋前後教了十年的書，戊戌那年他為實踐諾言不再赴試，反而在戊戌農曆大年初一（公元一八九八年元月二十二日，星期六），候在北京彰儀門大街上，等左都御史瞿鴻禨朝賀過後回府，一把拉住了轎槓，遞上了一個文長三千字的改革政治摺，請瞿鴻禨代為轉奏皇上。瞿鴻禨倒也立命轎夫止步，就在大轎裏面，把吳稚暉先生的上書，約略看了個大概，然後向他慨乎言之的說：

「唉，時局到了這步田地，有話自然該說。祇不過，你這個摺子，其間還有待商榷，讓我帶回去細細看過以後，再作計較。反正你在摺子上留得有通訊處，有事我自會按址通知，祇是我另有一言相勸，你們認真從事學問，也是很要緊的。」

吳稚暉先生這唯一的一次上書，為時在康有為第六次上書的七天以前。由此可證，他對大清帝國，總算也曾盡過言責。

最厲害的「公道大王」

戊戌之秋，吳稚暉先生到上海南洋公學任教，月薪四十兩，因此同期又慫恿同鄉，在無錫崇安寺成立一所



國父在倫敦偕吳敬恆攝於吳氏寓所，中為吳氏公子吳蕃。

三等學堂，開始維新教育，庚子八國聯軍之役後，他聽從鈕惕生、陳冷血（景韓，抗戰勝利後擔任申報發行人、總主筆）的建議，要求發給南洋公學學生槍械，鍛鍊軍國民，為當道所拒絕。明年，又倡立羣智會，讓學生輪講，力主師生共同治校，這便是吳稚暉先生民主思想，改革觀念的發皇。可是，他的主張始終為南洋公學總辦（校長）張菊生（元濟）所反對，因而他繼北洋之後又南洋，再一次與學校行政當局意見不合而請辭，尚且乘桴於海，東渡扶桑，就讀於高等師範學堂。

就在這一年的冬天（辛丑、一九〇一），吳稚暉先生因友人陸爾燧（煒士）之介，和鈕惕生自日本啓程入粵，他去籌備廣東大學堂，鈕惕生前往策劃武備學堂之設立，這是吳稚暉先生破題兒第一遭跟滿清官吏打交道，時任兩廣總督的是浙江嘉興人陶模，字子方，又字方之，同治七年進士，從老虎班子（進士出身）的甘肅文縣知縣，做到了兩廣總督，他是遜清著名的能吏、幹員，曾經力抗英俄，收復帕米爾高原。庚子那年，他六十六歲，開府廣州，很有作為，陸煒士便是他的幕客。辛丑想辦兩廣文武最高學府

，乃由陸煒士介紹吳、鈕二氏前去，兩人抵達廣州以後，陶模和他的兒子，也是進士出身的陶保廉，對他們優禮備至，十分愛重。招待他們住在總督衙門西花廳，倘或上街「拍拖」（散步），廣州市民都尊稱他們爲「洋先生」。

吳稚暉、鈕惕生兩先生到達廣州時，陶模正年邁體衰，臥病在床。他是在病榻之畔接見這兩位「洋先生」的，賓主相談頗歡，談起籌辦文武二校的事情，陶模說他已委姚文卓爲廣東大學堂總辦，擇定張之洞當兩廣總督時所建的廣雅書院再添上濂溪祠爲校址。武備學堂尤且收到南洋僑商的捐款八萬兩，乍看起來一切都不成問題，然而却在密鑼緊鼓的籌備時期，施予陶模的打擊却接二連三的來臨。由於陶模病喘十年纏綿不癒，年紀已六十八歲，所以他曾三度請辭，乞歸骸骨。當他獲得清廷覆電准予開缺，派廣州將軍德壽兼攝粵督；那德壽原是個貪鄙驕妄，粗魯無文的旗員，他一向對陶模必恭必敬，唯命是從。這一下陶模告老，他上台了，登時就把臉一抹，神色大改。他在以新帥身份拜會舊帥，一見陶模的面就盛詞詰責，有如長江大河，從下午兩點鐘罵到深夜九時，將陶模到任以後所辦各事逐項駁斥，罵了個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陶模則唯有忍氣吞聲，俯首不語，可是德壽一走，他便噴了一口鮮血，無巧不巧的是當天夜裏他又接到武昌知府梁鼎芬一封電報，梁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左右的紅人，他曾在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中法之戰時上疏請殺李鴻章。李鴻章當然不會見殺，梁鼎芬却因而名滿天下。他身爲廣東老鄉，認爲姚文卓不該拆毀廣雅書院和濂溪祠，於是在電文中有如下的激昂字句：

「妖言惑道，亂我廣東，全省士民，思食汝肉！」

這一封電報由姚文卓轉呈陶模，已經使他够受。不料，次日一早張之洞的電報又到，對他一手創辦的廣雅書院被「毀」，也在頗表不滿，大發牢騷，復以陶模一辦移交，德壽便將南洋僑商捐助興學的八萬兩銀子中飽

私囊，德壽一賴賬，陶模又將如何交代？所以他是活活給氣死，逼死了的。這一幕幕看在吳稚暉先生的眼裏，確曾使他義憤填膺，深覺滿清政治腐敗，官場無可救藥。不久以後他就和鈕惕生、陸煒士相偕回到日本了。

遠走高飛逃到英倫

吳稚暉先生第二次和滿清官吏打交道的對手，是清廷駐日公使蔡鈞。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夏天，吳摯甫（汝綸）就任北京大學前身——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。他赴日考察教育，吳稚暉先生託他跟蔡鈞說項，保送蘇浙贛自費留學生九人進入成城學校，專攻軍事。蔡鈞答應了又翻悔，吳稚暉先生便和孫揆均帶了二十六名學生到公使館找蔡鈞理論，其餘的留學生也相繼起而聲援，雙方僵持了一星期，蔡鈞竟然卑鄙無恥的施出了殺手鐮，唆使日警驅逐吳稚暉先生出境，爲這件事更使他對滿清官吏全盤失望，不再寄予幻想。思想永遠進步，學問不斷革新的吳稚暉先生，終於決心奔走革命，推翻滿清。是年五月他和蔡元培先生回到上海，十月成立愛國學社，翌年正月初他開始在張園安愷第會場公開發表演說。又以「蘇報」爲機關，照吳稚暉先生自己的說法是：「鼓吹罷學，與夾帶革命，雙方並進。」

當中外矚目的「蘇報案」起，清吏搜捕頗急，吳稚暉先生揹着「昌言革命，煽亂謀逆」的「罪名」，在上海已經無法存身了。他方始在家人友好的勸促之下，遠走高飛，逃到英倫。不久，又獲友人張靜江（人傑）、李石曾（煜瀛）之助，將吳夫人袁雲慶女士，和女公子吳芙、男公子吳薺，一齊送到倫敦去定居。

在倫敦住了一年多，直到光緒三十一年乙巳（一九〇五）春天，國父和吳稚暉先生首度晤見以前，吳稚暉先生是只有革命的行動，並無革命的宗旨。所以國父和吳稚暉先生在倫敦的會晤，可說是吳稚暉先生畢生志業的一個重大關鍵，同時也是我國國民革命史上，相當重要的一頁。吳稚暉先生曾經追憶的說過：他早在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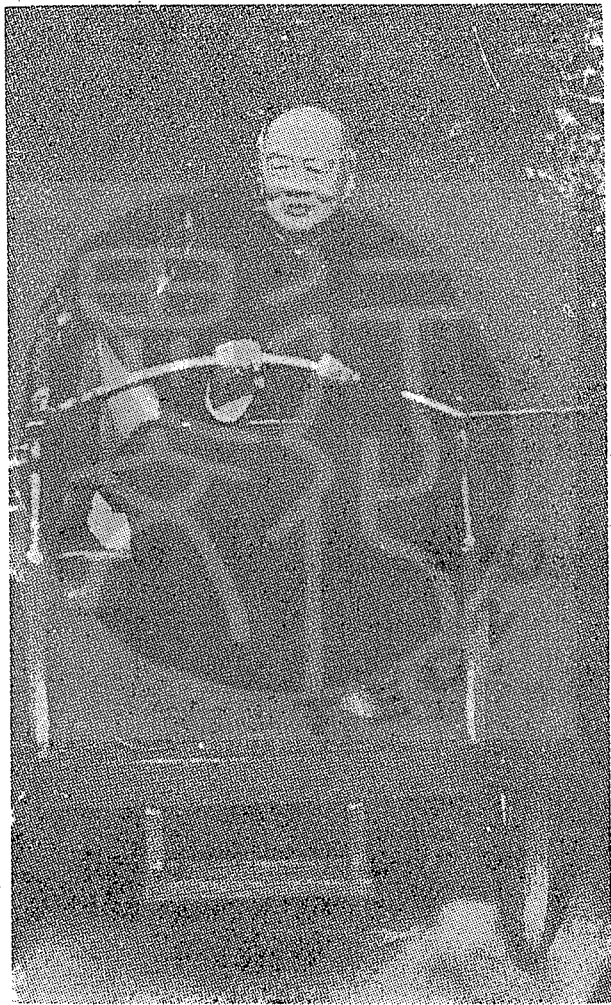
午（一八九四）那年，就曾在一本洋人編的華文雜誌上，讀到國父「上李鴻章書」那篇文章。但是他却没有記住作者姓甚名誰？次年乙未，他又披閱報紙，獲悉廣州出了一件「造反」的案子，從海關上抄出許多槍枝，為首者姓孫名「汶」。這就是滿清官方發佈的第一次革命——廣州起義新聞。清吏居心險惡的在國父的名諱之旁加上三點水，果然使猶在「八股先生」階段的吳稚暉先生，誤以為他是「紅眉毛綠眼睛，最利害的公道大王」，甚至把他跟橫行浙江沿海的江洋大盜黃金滿誤認作同一個人。在此一時期，吳稚暉先生對革命的認識是三千多年以前歷史上湯武的故事，商湯伐夏桀，周武王滅夏紂，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」那是聖人的作為，已見其二，便斷然不可再有第三次。後世之人倘敢侈言革命，那就是「造反」，同於「強盜作亂」。

戊戌政變，變法維新，吳稚暉先生的思想已經漸漸趨向維新，當年三十三歲的國父孫中山先生，却已在海外完成了三民主義的輪廓。但是吳稚暉先生說他仍還不會認識國父究竟有什麼「法寶」？一直要到兩年後的庚子（一九〇〇），國父再度起義於廣東惠州，因為革命先烈史堅如殉難，這才使吳稚暉霍然省悟「孫文不是尋常的強盜」，他這個人一定有點來歷。從此，革命二字，在吳稚暉先生的心目之中，畢竟也可以登大雅之堂了。祇不過，吳稚暉先生這一項重大的轉變，最主要的關鍵，還是冲着史堅如是翰林公的兒子而來。普天之下，焉有翰林之子，會跟着「強盜造反」，鬧得來殺了頭的呢？

平生僅見偉大人物

又一年，到了辛丑（一九〇一），吳稚暉先生三十七歲，他到日本去留學，和南菁書院同學鈕惕生同行，兩人合住在東京神田區凌明館。有一天，一位成城學生湖北人吳祿貞，和一位學農的安徽革命同志程家樾，雙雙來訪。說是跟鈕惕生先生約好了同赴橫濱看孫文，問吳稚暉先生要不要同去？吳稚暉當下一聽孫文的名字，

據他自己的形容是：「我雖不會駭成一跳，暗地裏却喫驚不小。」由於他先已聽說孫文和梁啓超，都在橫濱「上下其談論」，所以他回答吳祿貞等人道：



吳敬恆是一位人道主義者，他一生不坐人力車，有人送了他一輛，乃將車杆截去，當沙發坐。

「連梁啓超我都還不想去看他，何況孫文？充其量，一個草澤英雄，有什麼看頭呢？」

然而，吳祿貞、程家樾和鈕惕生，却不願和他引起爭辯，付之一笑，相偕去了。行前，跟吳稚暉先生約好，請他下午在淺草上野公園精養軒等他們回來，同進晚餐。吳稚暉先生那一天直等到傍晚時分，方始見到他們三位滿面春風的從橫濱回來。吳稚暉先生一見他們便問：

「怎麼樣？你們所見到的那位孫文，他是否像八蜡廟裏大王爺爺般的魁梧奇偉呀？」

鈕惕生先生正色的回答他說：「您大大的弄錯了，孫先生是一位溫文爾雅，氣宇偉大的紳士。」

——鈕惕生是江陰南菁書院的高才生，連素稱頑固蔽塞的清吏梁鼎芬，都對他非常之賞識，由而他也獲得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器重。吳鈕二氏同窗共硯已久，相知頗深，吳稚暉先生曉得他平生從無一句妄語，聽他這麼說時，吳稚暉先生自承他曾爲之大喫一驚。從此以後，國父在吳稚暉心目中的地位，便一躍而在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之上，甚或可與漢光武帝劉秀，和光武帝的大司徒，中興漢室雲臺二十八將之首的鄧禹媲美，所以，當追隨國父頗久的程家樾再追問吳稚暉先生一句：「你不相信他是革命領袖麼？」

吳稚暉先生便改用將信將疑的口腔，反詰他道：「他比梁啓超如何？」

程家樾連連的搖着頭說：「梁啓超不過是一介書生，我看他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。」

這時候，鈕惕生先生便岔進嘴來，鄭重其事的再補充一句，他說：

「可惜你沒有見到孫先生，如果你見到了他，一定會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」

吳稚暉先生曉得梁鼎芬最愛重鈕惕生，曾經保送他進入湖北陸軍小學，梁鼎芬尤將鈕惕生和陳景韓並稱二難。鈕惕生對梁鼎芬的道德文章，也是由衷的敬佩，而張之洞又是梁鼎芬的頂頭上司。因此，他便再作一比的問：「梁鼎芬是個頑固人物，固不必論，難道孫文就有張之洞的氣概麼？」



元國黨與恆救吳，後約新訂簽共中美中，除解旦一，梧恆年百
 、齡錫宋徐人四第、森林、恆救吳排一第起左，攝合袖領政軍，光
 、正居、賢傳戴、熙祥孔、欽應何、惠寵王人二第排二第。任右于
 。域鐵吳、汾淮丁、魯鄭、文子宋人三第排三第。科黎

他萬萬沒有料到，鈕惕生竟肯定的答以「國父氣概遠在張之洞之上，他說：

「張之洞，大官而已，你怎可以拿他和孫先生相比？說到孫先生的氣概，總而言之，他是我生平僅見的人物，再也沒有第二個人可以企及。這一點，你將來見到了孫先生的時候，自會明白。」

至此，吳稚暉先生自動糾正了他的錯誤觀念，他不再中滿清官吏橫加污蔑的餘毒。却是，他說他仍然並不願意去見這位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偉人——國父孫中山先生。

於是又過了三年，吳稚暉先生僑寓英倫，他已經自認爲不折不扣的革命黨。有那麼一天，吳稚暉先生的倫敦寓所有人敲門，打開門來一看，居然正是——國父孫中山先生。原來——國父是在赴歐拓展興中會會務途中，道經法國巴黎的時候，打聽到了吳稚暉先生在倫敦的地址，特地前來會晤。

由於吳稚暉先生心目中對於——國父的印象早已截然改觀，所以當他乍見——國父的溫和端正，平易誠懇，居然毫無驚異的感覺。相反的，使他驚歎不置的反倒是——國父舉止的偉大，不可形容的，自然而然的偉大。吳稚暉先生曾經分析過：世俗所謂的偉大，若非有條件襯托出來的，便是虛驕浮夸的貴人氣，他說：

「昔子望見齊王之子，喟然而嘆曰：『居移氣，養移體。』魯居至宋，噶于淫澤之門，守門曰：『此非我君，何其聲之似我君？』與總理同時的一個李鴻章，在各國亦頗受偉大的稱譽。然而却無貴人氣的偉大，在地氈上唾痰，在旅館裏罵西崽，總理是沒有那種惡習慣，又或者有道學氣，嚴氣正性，不可嚮邇，保持偉大的身份，與總理先後的，又有一個曾國藩。他的學養，不能不算偉大，但好像他做了我們的兩江總督，提倡勤儉，一時換不及衣冠，把灰布袍子，賣得比綉綢袍子還貴。總理就不注意這種矯枉過正。又或者有英雄氣，總理一生，當然革命了十來次，十三歲即想做洪秀全，然而並沒有嗚嗚叱咤，像洪楊那種萬歲、九千歲的氣概。又或者有橫議氣，古代公孫龍、張儀，也有人稱過他們爲大丈夫。總理一生，苦口婆心，見人即滔滔滾滾的指示他

的主義，然而祇樸實的抒其所見，絕不肯用手段，見一人說一樣話。所以康有為自命『長素』，以為比孔子還長，然而為了利用，便設立孔教會，保中國不保大清。又為了利用起保皇黨。他自以為議論偉大，終究止成了一個反覆的政客；總理却成爲真實不二價的黨魁。世俗亦有以為偉大者，或者能够擺出名士氣，總理一生研究的學問，够做一個大名士。然而他的好學，祇像周公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以集治國的大成。不像梁啟超談學派，講家數，有志維新，却終做了一個考據先生。因此總理品格偉大，終出於自然，也絕不必四十不動心，說大人則藐視之，下一番矜張工夫。他往來歐美，無論那一國的王公貴人，高人學士，都一見而心折，待之如最誠實的紳士。他絕對不拘什麼禮服，白領子等繁重儀式，而周旋亦自然中節。」

從紅眉毛綠眼睛的江洋大盜，到「品格自然偉大，度量自然寬宏，精神自然專壹，研究自然精博」的世界性最高貴紳士，「一個天生的偉人」，「一個天生創造主義的黨魁」，使人人敬佩到「五體投地」。吳稚暉先生對於「國父的真正認識，那是從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，國父上書李鴻章，吳稚暉先生初次讀到「國父」的名言讜論時起，直到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）國父和吳稚暉先生在倫敦會晤，前後十一年間，吳稚暉先生由無錫而上海而天津北京，而東京而倫敦，思想不斷革新，學問迅速增進，再經過親眼目覩，親身體驗所得來的。因此，乃在他心目之中成爲永遠顛撲不破的至理。

國父在抵達英倫訪晤吳稚暉先生之前，先已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成立了與中會歐洲分會，有史青、賀之才、魏宸組等三十餘人加盟，在英倫，則唯有孫鴻哲一位與中會員。縱使吳稚暉先生當年已因「昌言革命，煽動謀逆」的滅門之罪逃亡海外，而且他自己確也儼然革命黨，可是，國父和他的第一次會晤，却並不會提過希望他也加入與中會的話，甚至吳稚暉先生在晤見以後追憶，當時放言高論，大談革命的反倒是他自己。事後他也曾自忖：國父爲什麼不欲其早日加盟呢？據他的推想，可能有兩層緣故：其一是他的頭巾氣還很重，不像

是個革命黨，因而使國父有隱拒於千里之外的感覺。其二則是國父具有真知灼見，明知他的程度還不够躋身革命黨員之列。

時然後言樂然後笑

但是國父對於吳稚暉先生却殷殷相待，自然懇切，他邀他到康德黎老師的家裏去喫晚飯，把他介紹給康德黎老師及其夫人，並且言明他自己不日即將再赴美洲，請康德黎夫婦對吳稚暉先生客居英倫的一家大小，在遇有緩急時多多照拂。

這一年的六月十一日，國父離歐轉赴日本，七月十九日抵達橫濱，民前七年（一九〇五）八月二十日，陰曆七月二十日，星期日，中國同盟會舉行成立大會於東京赤阪區靈南日人阪本金彌宅，同年之冬，曹亞伯從東京到英倫，邀請吳稚暉先生加盟，吳稚暉先生立刻就慨然應允，正式入盟時，有曹亞伯、孫鴻哲在場，當曹亞伯出示盟書，吳稚暉先生看到誓詞之中有：「當天發誓……」之語，他情不自禁的揚聲大笑，而且往後還會坦承：「且作惡」，吳稚暉先生說：

「我們要革命就革命好了，何必去學那康有爲的行徑，發什麼富有票呢？」

曹亞伯在一旁聽了，瞠目不知所對。倒是孫鴻哲岔進嘴來，冷冷的說：

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先生也曾聽過此一說麼？我是老早已經寫就這份盟書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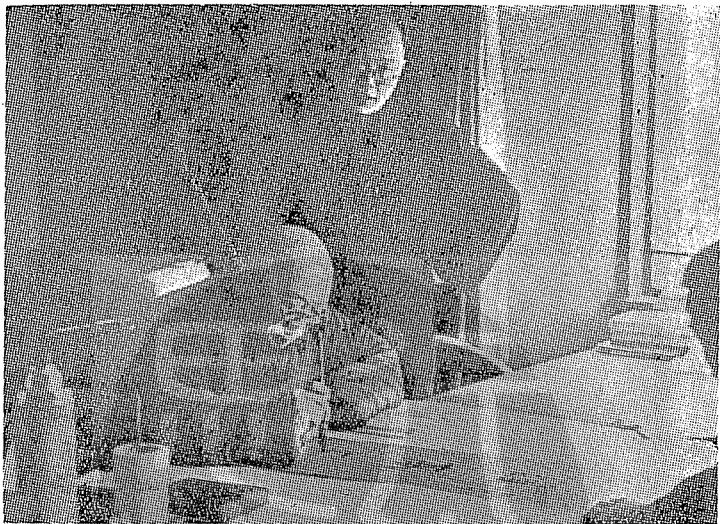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一語，在當時確有醍醐灌頂之勢，使吳稚暉先生聽後先是一怔，繼而便大澈大悟，他立刻就寫好一份盟書交給曹亞伯。而且，從此以後他便打破了士大夫式的觀念，反倒竊笑梁啟超之輩的狼狽周章，俱爲頭巾所誤。

正式成爲同盟會員以後的吳稚暉先生，他對國民革命所作的重大貢獻是盡人皆知，必將永垂不朽的。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他和張靜江、李石曾兩位先生在巴黎組織世界社，創辦「新世紀」，自此以其淵博的學識，雄健的筆鋒，集中全力排滿、斥僞立憲，喚醒國魂，誠勉黨人，施保皇黨徒以致命打擊。他的至理名言，有「排滿革命，非種族上之問題，乃革命條件上之事類也！」「滿洲之僞立憲，保皇黨教之也；秀良之鬚士，盡浮沉北京之郎署，保皇黨導之也；國內之新黨，由卑屈而成腐敗，保皇黨煽之也；海外之民德，由熱中而成媚官，保皇黨導之也！」他罵麻木的國人爲「豬生狗養」，向叛黨的敗類提出警告：「至於個人，某甲非而乙是，革命黨且共棄甲矣。果甲是而乙非，革命黨則又共棄乙矣，區區數人，於革命黨之全體何涉哉？且革命黨亦樂取黨中之敗類，著其叛黨之罪惡，明告世人，以免其害羣！」在在都是那麽樣的大氣磅礴，痛快淋漓，至今讀來，猶仍令人血脈憤張，滿心振奮，吳稚暉先生當年的一支健筆，真不啻十萬黨軍。

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八月七日，陰曆七月二十二，星期六，國父在第四次環遊世界旅途之中，從布魯塞爾到了倫敦，第二天他就和吳稚暉先生見到了面，那一天是星期日，又值立秋，久別重逢，彼此都非常之高興。國父還跟吳稚暉先生及其公子吳薺，合攝一影留念，那一幀照片一直流傳至今，已成爲備極珍貴的國父旅途留影之一。

國父原定在倫敦就攔四五天，然後買棹赴美，可是因爲各方函電商洽，行期一延再延，直到十月三十日（陰曆九月十七日，星期六）方始啓程。這一回，他在倫敦停留將近三個月，整整十二個禮拜。

在這一時期之內，以吳稚暉先生和他過從最密，談得最多，吳稚暉先生也曾協助國父處理了不少重要事務。由於行程展緩，用費超出了預算，曹亞伯唯恐國父川資不敷，他在旅英同學之間，湊了四十英鎊，送到國父所住的旅社。曹亞伯把這筆錢留在桌上，然後與辭離去。



吳敬恆八十三歲時在滬寓寫石鼓文聯。

國父認為這是同志們對他的誠意獻納，因而也就坦然的收下。這一件小事，却使吳稚暉先生得到一項啓示，從而有所領悟，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說：

「總理在這種辭受，又毫不矯揉做作。想起從前孔子問孔文子（圉）的來使，問孔文子有什麼美德？使者回答道：『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』孔子馬上有點不相信，說道：『是這樣的嗎？難道竟是這個樣的嗎？』孔子當時不大相信孔文子。我想孔子若遇到總理一定相信，相信他真有這種自然。」

然而，到了第二天，國父却用曹亞伯所獻的那四十鎊，買了一大堆的書，使曹亞伯見了，不勝驚異。他很有急的跑去告訴吳稚暉先生說：

「我看先生恐怕連房錢都付不出了，他爲什麼要買這許多的書呢？」

吳稚暉先生却深深瞭解 國父對於書籍的迫切需要，爲使他的主義更趨圓滿，爲使他的事業早日成功，國父必須對每一門新知，都積極研究到既博且精。因此他笑了

笑說：

「你管他做什麼呢？他帶有箱子四五隻，却都帶些書。內中還有一部局刻的資治通鑑，那是因爲他少君在舊金山留學，特地帶了去給他讀的。」

國事必問官不必做

在大黑暗中出現了一道曙光，終於到了辛亥年十月十日（陰曆八月十九，星期二）武昌起義，一戰成功，全球各地的炎黃子孫熱烈慶祝興奮若狂。十月下旬，國父從美國抵達倫敦，他在晚間八時往訪吳稚暉先生，可是吳稚暉先生却和張靜江先生相偕外出，國父便給他留了一張便條，約定翌晚八時再來相晤，信中有謂：

「近日中國之事，真是泱泱大國民之風，從此列強必當刮目相見，凡我同胞，自當喜而不寐也。今後之策，只有各省同德同心，協力於建設，則吾黨所持民權民生之目的，指日可達矣。」

國父在倫敦下榻於薩福伊旅社，積極辦理外交事宜，吳稚暉、張靜江兩位先生，都是他的得力助手。勾留半個多月以後，國父自英倫啓程赴法，會晤法國的老虎總理克里孟梭。行前他堅邀吳稚暉先生和石瑛回國。因爲吳稚暉先生要到柏林打一轉，跟時在柏林留學的蔡元培先生見一次面，代表國父邀蔡元培先生返國任事。所以國父由朱卓文、李曉生兩人陪同先自馬賽啓程，而在十二月二十五日（陰曆十一月初六，星期一）到了上海。吳稚暉先生一行自意大利乘下一班船，十二月三十日（陰曆十一月十一，星期六）抵達，國父已在先一日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。兩天後的中華民國元年元旦（陰曆十一月十三，星期一），國父乘專車赴南京就職。吳稚暉先生則在元月四日方自上海到南京，他被迎迓到臨時大總統辦公室，地點就在國民政府旁邊參謀本部的那一排洋樓。

國父只用兩個房間，裏面一間充臥室，外面一間作辦公與會客之用。吳稚暉先生抵步，國父便邀他同室而住。在這時候他業已深以做官爲戒，抱定了主張：「官是一定不必做的，國事則一定不可不問。」吳稚暉先生在大總統辦公處和國父同住了四天，凡事一概從旁協助，堅拒委他一官半職。吳稚暉先生曾經談過他那四日間的所見所聞，他說：

「常來辦公的，有胡展堂（漢民）、廖仲愷兩先生，還有幾位不認識的華僑，也來寫外國文件，我在那裏四天，晚上祇有胡展堂先生，與他（按指國父）商量明天應爲之事，我在傍靜聽，他吩咐胡先生，胡先生終是唯唯，然而到明天辦了以後，胡先生晚上來報告，不照他吩咐的，似乎很多。然而總理更好像依他做的一樣，點頭認可。大約他發現辦得不錯，不必全照己意，而且也並不分別出來，明說雖非我意，辦得也好，防人以後不照己意。古人所謂：『樂取于人以爲善』，我讀書時不大明白他的用意，見了總理的任使胡先生，才明白這是極贊聖哲的度量。這種待人處事，一切自然的寬宏大度，也決非光用學力得來，而是有天賦的德性在內。」

吳稚暉先生又曾談過 國父辭卸臨時大總統，舉袁世凱以自代，那以後專心一志，埋頭國家建設時他的見聞所及，他說：

「他（按指國父）民國元年，把大總統讓給袁世凱，他也希望袁世凱有一點天良，對待中國穩足的做法，讓他趁這個當口，在十六年中，完成了二十萬里鐵道再說。所以他辭了大總統，情願做鐵路督辦，決不是尋一個事體，養養身體，拿點薪水來休息的。他是熱心要把二十萬里鐵道，彈指實現。他在上海立了一個鐵道督辦辦事處，我也到過好幾次，總是地圖攤滿了一地，自己伏在地圖上，拿鉛筆東畫西畫。凡是鐵路工程的圖書，每間都堆着，他又研究到自然精博，決不肯含糊的。可惜他第一條想造的路是條欽渝鐵路，借款也已經成

功。不料自己的黨人上了袁世凱的當，在參議院反對借用外債，而且不久宋教仁案子也出來了。他知道袁世凱決不是一個東西，二十萬里鐵路也決不是當時所能造成。所以把第一條要造欽渝鐵路的合同，印在他實業計劃的後面，作一個歷史的紀念，就興起二次革命。現在不說別的，單講那條欽渝鐵路，當時若完成了，便於現在的西南交通，又如何？」

吳稚暉先生從「陋儒式」的「八股先生」，到引領在時代之前的先知先覺，同盟會員，然後再由革命聖人、開國元勳而「官必不做，國事必問」，就凡夫俗子的「人之常情」而言，委實有點令人莫測高深，不可思議，够得上稱爲他畢生傳記中最富傳奇意味的一段。然而我們却不可忽略，吳稚暉先生對於「國父博大精深的政治理想瞭解之深刻，與乎自然偉大的行誼仰慕之衷誠。因而他確能以活潑潑的天機，生生不息的精神，擇定了他盡瘁終日的目的，探求宇宙的奧祕，從而擴大人生的價值，用科學支配自然，再以支配的自然增進人類福祉。他致力於提倡科學與工藝，同時並以勤工儉學的方式培育人才，使中國早日成爲現代化的泱泱大國。此所以，吳稚暉先生是一位大哲學家，也是當代屈指可數的一位社會改革家哩。